

國家發展研究 第十二卷第一期
2012 年 12 月 頁 1-42

我國解嚴後克服過去與刑事補償規範變遷之法律政治分析

陳顯武*、蔡浩志**

收稿日期：101 年 3 月 10 日

接受日期：101 年 6 月 19 日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專班研究生、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軍事檢察官

摘 要

本文由解嚴前後法律之政治分析出發，說明我國刑事補償法制之變遷演進，再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為脈絡，同時檢視刑事補償規範之制（修）訂過程，用以分析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戒嚴時期人民權利受損回復條例、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冤獄（國家）賠償法及晚近刑事補償法之再造等規範競合情形，以期匯集「克服過去（轉型正義）」之補（賠）償措施在台灣的實踐經驗，並闡述國際刑法就體系不法行為的處遇理念。

關鍵詞：轉型正義（克服過去）、刑事補償規範、法律變遷、解除戒嚴、法律政治分析

壹、前言－從刑法之政治分析觀點出發

西元（以下同）1948年（民國37年）5月10日國民大會公佈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1條，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國民政府於1948年（民國37年）援引1934年（民國23年）公佈實施之戒嚴法（*Martial Law*），宣布除台灣、新疆及西藏等地外，全國於同年12月10日起，實施戒嚴。¹隔年（1949年；民國38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前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頒布「台灣省戒嚴令」（佈告戒字第壹號），將臺灣戰後「軍事接管與特殊化統治」轉變為「戒嚴法制」，宣告自同年5月20日起，在台灣省全境（台灣本島、澎湖群島及其他附屬島嶼）實施戒嚴，於台灣全島劃定戒嚴區域，至1987年（民國76年）7月14日總統令准立法院76年7月8日(76)台院議字第1641號咨，宣告臺灣地區自同年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為止，我國曾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²

因應戒嚴時期國家安全與統治需求，政府頒布建構於管制目的需求之法令，對於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公民政治權利進行體系嚴密、完整而滴水不漏之行政管控與政治審查。該等著眼於集體管理之行政管制法令，賦予明確之刑事規範外觀及懲罰內涵實效，基於

¹ 民國39年12月10日中華民國全國戒嚴令全文：「茲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規定，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規定：（一）全國各省市，除新疆、西康、青海、臺灣四省及西藏外，均宣告戒嚴，按戰地域及警戒地域區劃如附圖（略）。（二）戒嚴區域縣長兼理軍法職務，適用縣長及地方行政長官兼理軍法暫行辦法辦理，此令」。

² 接近中國大陸的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南沙的戒嚴（戰地政務）則至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改為地方自治後才解除，亦即金門、馬祖、東沙及南沙地區，自37年12月10日起至80年5月1日止，實施共長達近43年的戒嚴，是世界上實行最久的戒嚴令。

公眾安全、穩定統治之單一整體集合概念，對應於民主秩序基本價值與人權維護之間，該等戒嚴刑事法制，具備獨特歷史時空脈絡下之強烈政治性格。是以，戒嚴時期之政治系統與法律系統，相互牽引，各自有其既有功能與符碼，相互處於平行關係，而系統間，經由「有權力及無權力」、「法與不法」的操作，在功能上產生戒嚴政治及法律文化變遷之結構性連結（strukturelle Kopplungen）（Luhmann, N, 1995: 424, 440）。

束縛於戒嚴法制內之我國公民政治權利譜系變遷，自 1987 年解除戒嚴開始，雖一時之間尚無法完全褪去其集體統治之政治性格脈絡延續，仍因臺灣民主化腳步甫起，政經社會與文化變遷之開展，即開始逐步增強政治管制措施之法律性格。自臺灣省戒嚴令 1949 年 5 月 19 日頒布時起，政府相關行政及司法單位陸續研擬、公布包括「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懲治叛亂條例」及「戒嚴時期臺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等在內約 30 種管制法令，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解除戒嚴同時，明令廢止。

隨之而來，我國近 20 年的民主轉型進程，憲法與刑事法規範之修訂，成為落實基本人權的主要軸線，尤其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所引領之人權譜系變遷最為擅場。民主憲政國家之法治國原則，以平等權、比例原則、國家責任、權利救濟、公益特別犧牲補償等理念作為引導，同步引領刑事法制蛻變。時至 2000 年（民國 89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方興未艾之「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風潮，面對戒嚴時期政府集體統治措施引發之人身、精神、財產、表現、參政甚至環境、發展、文化之各面向之權利限制（侵害），「正義」其實「始終並未轉型」，需要轉型的應該是特定時代的執政者所塑造而生的「國家體制（體系）不法」，回顧戒嚴時期國家權力分配於行政措施、法制規

範或司法裁決之特殊憲政架構下，在國家體系內形塑權力運作模式，同時對人民基本權造成延續性或一次性的限制（侵害），縱然賦予「戒嚴時期」之「政治法律框架」，仍應在「非常時期（無論是以「戰時、動員戡亂或戒嚴」之名）」回歸「平常（承平）時期」後，以「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加以理解、評價、處理與轉型過往體系不法造成之既成損害（陳顯武，2001：221）。不管以改革行政措施，修改憲法及法律，「行政補償」或「司法賠償」等制度所為權利彌補（回復）之道，甚或係以追求真相之歷史觀點審視，進而為懲罰體系不法行為人的呼籲，均是正義理念訴求與實踐，亦可能因亙古的自然法正義，透過新世紀政治刑法與國際刑法的交錯落實而有共識（鄭文中〔譯〕，2007：15-16、27-28）。³

本文即由解嚴前後法律之政治分析出發，首先概括闡述解嚴後刑事補償法制之變遷演進，再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為題綱，同時與刑事補償法律之制（修）訂相互檢視換軌，分析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補償案件條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冤獄（國家）賠償法及晚近刑事補償法之再造與延續等規範競合情形，用以匯集「克服過去（轉型正義）」之補（賠）償措施在台灣的實踐經驗。

最後，再以國際刑法就體系不法行為的處遇理念作為引導，闡述國際法對於政治刑法與轉型正義之實踐影響，以及我國在同一法治課題而不同歷史情境下所建構補償正義模式，用以作為將來我國刑事補

³ 提出擴展刑法學的科際整合外，仍應加強國際化（全球化）時代之刑法學變遷，溯源於自然法，藉由保護人權的國際條約，補充國際法益之保護，刑法必需朝向國際化的規範體系發展，以回應對於體系不法之克服，折衷於轉型期刑事正義與諸多仍被承認而堅持之刑法原則，尤其在不溯及既往、時效制度及罪刑法定主義之間，國內法透過轉型期實現刑事正義的同時，必需確實回應國際刑法的正義訴求。

償政策、法制、組織及執行各面向再次深化發展的參考聚焦。

貳、雙軌體系實踐下我國刑事補償正義之演進

一、解嚴後刑事權利保障及補償制度與克服過去之辯證分析

戒嚴法制之定位屬性，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實質凍結憲法效力之存在，向有「憲法破棄」或是「戰時憲法」辯證，⁴然在戒嚴法制之統治權專斷下，1987年解除戒嚴與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盱衡斯時國內外情勢，及黨政與國家連結密度，應係當政者意志貫徹下政治決定之結果，賦予行政權運作之實效，併同行政與刑事法律變遷外貌，並為解嚴前後因應政治型態之規範轉變，進而牽動戒嚴前後法制轉型。此即政治因應歷史、時空外在情勢，必須做出朝向於穩定而可期待之規範決定，法律即是此種規範決定的恰當途徑，即形成「法的拘束力外框」（陳顯武，2007a：165），藉由此種透過政治決定以形成規範秩序之遞嬗，戒嚴法制變遷即可謂適例。至解嚴之後，我國「刑事權利補償」之法制變遷，可按法制創設進程，概略區分不同之時期進程，允宜以「多軌法律與政治規範建構與過渡」與「行政補償及司法賠償雙軌併行」概念理解。

因應解除戒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國家安全法等配套法制過渡調整與廢止，在內國政治民主化發展的引領下，憲法基本權之保

⁴ 「增修條文」係在同一部憲法內，以條文增補並凍結原有條款的方式，發生憲法修訂之實質效力，使憲法之修訂「向後發生效力」。至於「憲法破棄」，則以按固有憲法的修憲程序，另外創設一部「全新，非以憲法為名稱」之特別規範，取代原有憲法的效力內涵，而固有憲法僅為「暫停適用」或「部分停止適用」，待特別規範失效後，原有憲法則回復效力。

障逐步在司法制度中深化，即以違憲審查制度發展之取徑，及國際間刑事人權法規範的實質強化與變遷，對於內國法律規範的影響，無不開展著我國「歷史／結構」脈絡中，相應於各該時期國內外政經情勢演變，建構出我國刑事補償法規範變遷的五個階段：首先，第一階段應由民國 76 年 7 月 15 日公告解嚴前後為開端；至第 2 時期，應以民國 84 年 1 月 28 日「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公布時開始，我國首部針對戒嚴時期人民財產、精神、名譽與人身受損權利彌補之法規範制訂，亦是採取司法權利補償之初創；至第 3 階段，應以民國 87 年 6 月 17 日「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公布開始，因針對戒嚴時期體系不法作為，由國家予以補償之「行政補償」制度創設，並於民國 88 年 3 月 9 日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以下簡稱補償基金會）」，並於同年 4 月 1 日正式運作開始（陳志龍，2001：37-63）；第 4 階段，則由民國 96 年「冤獄賠償法」修訂伊始，將我國原有之冤獄賠償體系，明確其求償範圍，將刑事訴訟與軍事審判程序等同視之，並將非依法律受羈押、收容、留置或執行之案件納入賠償範圍，且不侷限於戒嚴時期，尤其透過大法官會議第 228、477、487、567、624 及 670 等號解釋，具體明確化冤獄（國家）賠償權利補償之要件，因應實務所需，擴大其適用範圍，對於請求權排除規定之限縮，援引特別補償等公法理念，作為刑事補償基礎之擴大與質變基礎，宣告對於體系不法行為之國家責任，無論是行政不法，或司法不法作為之補（賠）償規範，均於法制面逐步確認；邁入第五階段，乃至民國 100 年 6 月 13 日立法院修正三讀通過，將「冤獄賠償法」易幟為「刑事補償法」，落實前揭大法官會議第 670 號解釋意旨，體現「國家行為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構成人民權利之特別犧牲，而得向國家請求補償」之理念，同時擴大聲請補償之事由（包含所受人身自由限制之處遇種類，及國家程序行為造成補償事由之類型），進一步限縮「不予補償」之排除事由，即不

得再以「遭限制人身自由之行爲人自己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爲」作爲拒絕補償之理由，以「行爲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爲拒賠事由」之個案，其重新請求後之補償金額，亦僅得以酌減，而非全部不予補償。至此，我國刑事補償法制邁向新的里程碑，而重新建構之回溯 5 年期間，曾以「行爲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爲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如」等作爲拒賠理由之個案重新審認，以及准予補償之國家行爲類型與構成特別犧牲之處遇種類範圍，將成爲晚近實務觀察重點。

表 1 解嚴後我國刑事權利補償立法變遷

時期	特徵	時間起迄	規範變遷內涵
一	解嚴終裁過渡期	76.7.15 前後至 84.1.28	因應解除戒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國家安全法等配套法制過渡調整與廢止，從憲法層次落實至各實體法部門，將我國法規範由戒嚴（戰時）法制，透過政治力的牽引，轉變爲正常（平時）法制。
二	權利回復創始期	84.1.28 至 87.6.17	訂定「戒嚴時期人民權利受損回復條例」，爲我國首部針對戒嚴時期人民財產、精神、名譽與人身受損權利彌補之法規範制訂，亦是採取司法補償之開端。在冤獄賠償法之原有法制上，建構特別針對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之補償（回復）法源，另爲處理二二八事件賠償事宜，並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和，訂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三	行政補償轉型期	87.6.17 至 96.7.11	公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行政院核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透過賦予法源與組織權限，針對戒嚴時期體系不法作爲予以補償之行政補償制度創設，並於 88 年 3 月 9 日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並於同年 4 月 1 日正式運作。嗣後，由國防部、行政院及補償基金會，陸續多次修訂「戒

時期	特徵	時間起迄	規範變遷內涵
			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行政院另核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辦法」，同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權利受損回復條例，亦經多次修訂轉型。
四	國家責任確認期	96.7.11 至 100.9.1	由 96 年「冤獄賠償法」修訂伊始，將我國原有之冤獄賠償體系，明確其求償範圍，將刑事訴訟與軍事審判合一，並將非依法律受羈押、收容、留置或執行之案件納入賠償範圍，且不侷限於戒嚴時期，尤其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使冤獄（國家）賠償權利補償之要件具體明確，因應實務所需，擴大其適用範圍，對於請求權排除規定之限縮，援引特別補償等公法理念，作為刑事補償基礎之擴大與質變基礎，宣告對於體系不法行為之國家責任（包括行政及司法不法作為）之補（賠）償規範，均於法制面逐步確認。
五	刑事補償再造期	100.9.1 迄今	我國於 98 年 5 月 14 日正式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立法院亦因應大法官會議第 670 號解釋，體現國家行為對於個人人身自由之限制，構成特別犧牲，應由國家予以金錢補償之意旨，「冤獄賠償」之用語走入歷史，更替為具有公法上補償內涵之刑事制度。本次修正，除規範更名外，亦擴大「得予補償之國家行為」及「所受人身自由拘束之處遇」之類型，亦即擴大補償範圍，亦限縮「因行為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等不予補償之排除事由適用範圍。

資料來源：補償、回復條例、冤獄賠償法及刑事補償法等法規條文。本文分析整理

二、解嚴後大法官釋憲與政治刑事案件補（賠）償措施之促進

（一）司法行為之國家賠償要件限縮於「犯職務之罪」及「經確定判決有罪」之「司法違法行為」，未涉及刑事違法之補償問題——大法官會議第 228 號解釋

本號解釋說明國家賠償立法，係依憲法第 24 條⁵ 規定所委託，自得就人民請求國家賠償要件為合理「立法形成自由（裁量）」，至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將「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之司法不法行為，賦予「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及「經判決有罪確定者」等要件，應屬於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公務員故意過失不法侵權」⁶ 之特別規定。因此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規範唯有「枉法裁判（即「犯職務之罪」及「經確定判決有罪」）」部分，方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補償，又僅有在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始有求償權（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3 項）。

此號解釋為解嚴後對於國家（公務員）責任之重要解釋，其關於「司法人員國家賠償責任限縮，係為因應自由心證與見解相異空間，維持審判、訴追獨立所必須」之理念，並明示「按憲法平等原則，因國家機關功能之差別，而對國家賠償責任為合理之不同規定」等理念，認國家賠償法針對司法機關具有審判及追訴職務特性，而為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相對於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之特別規定，為

⁵ 憲法第 24 條：「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

⁶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所必要，尙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第 7 條、第 16 條、第 23 條及第 24 條並無抵觸，而為合憲解釋，並成為大法官釋字第 670 號解釋引進「國家賠償係屬公益特別損失補償性質」時部分大法官意見書內之反思對象。

(二) 跨出無罪確定判決之外，擴大戒嚴時期權利回復之適用範圍——大法官會議第 477 號解釋

本號解釋從國家非常狀態之體系行為論點出發，闡釋立法機關為使戒嚴時期人民權利，因國家刑罰權之運作而受損害者獲得適切補償，於解除戒嚴後，制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對人民犯內亂罪、外患罪，符合該條例所定要件者，回復其權利或給予相當賠償，並認為上開條例適用對象明定為犯「外患罪、內亂罪」之人民，係基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實施戒嚴之情況下，指出「國家體系行為，其運作容有未盡現代刑事法治思維之處」。

進而，指出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⁷ 僅止於「受無罪判決前遭羈押」，未能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等四類情形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之人民，係對權利遭受同等損害，應享有回復利益者，漏未規定，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喪失人身自由之人民予以賠償，依憲法平等原則，衡諸事物之本質，並無作此差別處理之理由，顯屬立法上重大瑕疵。

⁷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規定：「人民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外患罪，於受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得聲請所屬地方法院比照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故本解釋結論認定，凡在不起訴處分前或後、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確屬有據者，「均得與無罪判決確定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同依該條例第 6 條比照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並給予自公布之日（88.2.12）起 2 年之請求權時效期間。

（三）確立冤獄賠償法規範性質，宣告冤獄賠償法明訂第 2 款前段「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應施以保安處分」之排除請求規定違憲——大法官會議第 487 號解釋

本解釋首先明示：「冤獄賠償法為國家賠償責任之特別立法，立法機關基於憲法第 24 條之委託，有制定有關國家賠償法律之義務，而此等法律對人民請求各類國家賠償要件之規定，並應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另說明：「刑事被告之羈押，係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於被告受有罪判決確定前，拘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乃對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嚴重限制，故因羈押而生之冤獄賠償，尤須尊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精神」。

從而，冤獄賠償法第 2 條對冤獄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定有限制，其第 2 款前段規定，曾受羈押而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宣告者，若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則不得請求賠償。其立法目的雖在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道德，然「泛以公序良俗之違反為理由，使身體自由因羈押遭受嚴重限制之受害人，其冤獄賠償請求權受到排除」，而未能以其情節是否重大，致為社會通常觀念所不能容忍為衡量標準，與同款後段及同條其餘各款所定之其他事由相較，亦有輕重失衡之處，實與憲法上之比例原則未盡相符。

該號解釋即指出前開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2 款前段「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應施以保安處分者」作為「請求國家賠償例外情

形」之規定違憲，自民國 88 年 7 月 9 日起，應不予適用。

(四) 由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引伸
國家行為「拘束人身自由」定義與實質效果之明確化——大
法官會議第 567 號解釋

本解釋說明，我國於動員戡亂時期與戒嚴時期，係處於非常時期之國家體制，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之保障，固得為因應非常事態之需要，而對其權利作較嚴格之限制，固與平時不可等觀。但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縱於非常時期，對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仍須合於憲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之規定，⁸ 並應以憲法基本權保障為核心。

本解釋進一步指出，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規定國家機關得以人民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為理由，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無異於允許國家機關得以強制方式改造人民之思想，箝制思想自由，對於人民內在精神活動之保障不足，對於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有所妨害，亦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有重大指標意義。

從而，前開管教辦法第 2 條，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本旨，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規定，

⁸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揆其意旨，係指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應以法律規定，並經審判程序，始得為之。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其內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縱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仍不得逾越必要之限度，復為憲法第 23 條所明定。

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不許，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從而宣告該辦法違憲。

是依「內容實質違憲」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規定，⁹ 對匪諜罪犯受徒刑或感化教育已執行期滿者，「不予釋放而逕行拘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不論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訓處分，實與剝奪人民行動自由之刑罰無異，性質上均為嚴重侵害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依憲法第 8 條之規定，應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始得為之。

前開管教辦法規定由法院以外之機關，即該省最高治安機關依行政命令核定其要件並予執行，與憲法第 8 條之規定顯有牴觸。又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應由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加以規範，且其內容須實質正當。前開辦法僅係行政機關自行訂定之命令，即得對已服刑期滿之人民再行交付未定期限之管訓，不符合憲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規定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本解釋結論認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人民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外患、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之罪，於有罪判決或交付感化教育、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未依法釋放者，得聲請所屬地方法院準用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係指於有罪判決或感化教育、感訓處分裁判執行完畢後，任意繼續延長執行，或其他非依法裁判所為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未予釋放，得請求國家賠償之情形而言，從而前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即屬回覆條例前開規定所稱「交付感化教育、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未依法釋放」之情形，該等「未依法釋放」

⁹ 「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規定：「匪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感化教育，已執行期滿，而其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者，得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第一項）。前項罪犯由執行機關報請該省最高治安機關核定之（第二項）」。

原本植基之「管教辦法」已屬違憲，因而，「任意繼續延長執行」之期間，自得依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向所屬地方法院用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五) 基於憲法平等原則，軍事審判程序亦得適用冤獄賠償法請求國家賠償——大法官會議第 624 號解釋

本號解釋，即以憲法第 7 條出發，指出「同等損害，同等保障」事理，說明立法機關制定冤獄賠償法，對於人民犯罪案件，經國家實施追訴、審判及刑罰執行等刑事程序，符合該法要件者，賦予身體自由、生命或財產權受損害之人民，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

該號解釋，從憲法第 77、80 條「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大法官會議第 436 號解釋「國家刑罰權下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與憲法第 9 條引伸「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之特別規範立場，說明司法審判與軍事審判兩種刑事訴訟程序，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人民之自由、權利於該等程序中所受之損害，自不因受害人係屬依刑事訴訟法令或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而有異，軍事審判法既屬特別之刑事訴訟法，冤獄賠償法第 1 條規定，¹⁰ 其規範國家對犯罪案件實施刑事訴訟程序致人民身體自由、生命或財產權遭受損害而得請求國家賠償之範圍，依文義解釋，固可包含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遭致上述冤獄之受害人，均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是根據冤獄賠償制度之目的，立法者若對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所致身體自由、生命或財產權，遭受與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案件所致同類自由、權利同等損害之人民，未賦予冤獄賠償請求權，

¹⁰ 冤獄賠償法第 1 條規定：「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之案件，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賠償：一、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者。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第一項）。不依前項法令之羈押，受害人亦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賠償（第二項）」。

難謂有正當理由，方符憲法上平等原則之意旨。

該號解釋結論：「為符首揭憲法規定平等權本旨，在冤獄賠償法修正施行前，或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賠償事項之法律制定施行前，凡自 48 年 9 月 1 日冤獄賠償法施行後，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如合於冤獄賠償法第 1 條之規定者，均得依該法規定請求國家賠償，其時效從本解釋公布之日起算 2 年」。

(六) 解釋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受羈押」之排除規定不符比例原則與特別犧牲補償之限縮範圍——
大法官會議第 670 號

本號解釋援引大法官釋字第 400、425、516、625 等號關於「公益特別犧牲之補償」與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之觀點，併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384、588 號「人身自由之重要基本人權特別保護」理念，指出：「特定人民身體之自由，因公共利益受公權力之合法限制，諸如羈押、收容或留置等，而有特別情形致超越人民一般情況下所應容忍之程度，構成其個人之特別犧牲者，自應有依法向國家請求合理補償之權利，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平等權之意旨」。

本解釋說明，冤獄賠償法第 1 條第 1 項¹¹ 規定之國家賠償，並非以行使公權力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為要

¹¹ 冤獄賠償法第 1 條第 1 項：「依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或檢肅流氓條例受理之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賠償：一、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不受理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收容。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不受理或撤銷強制工作處分確定前，曾受羈押、收容、刑之執行或強制工作。三、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收容。四、依重新審理程序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前，曾受收容或感化教育之執行。五、不付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留置。六、依重新審理程序裁定不付感訓處分確定前，曾受留置或感訓處分之執行」。

件。是冤獄賠償法形式上雖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然本條項所定之國家賠償，實係國家因實現刑罰權或為實施教化、矯治之公共利益，對特定人民為羈押、收容、留置、刑或保安處分執行，致其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受有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限制，構成其個人之特別犧牲時，依法律規定，以金錢填補之刑事補償。

又按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人民之自由權利因公共利益受有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法律規定給予補償時，為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等情事，受害人對損失之發生或擴大，如有可歸責之事由，固得審酌不同情狀而排除或減少其補償請求權，惟仍須為達成該目的所必要。從而檢視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受羈押者，不得請求補償」部分，就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及軍事審判法第 102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羈押而言，並未斟酌受害人致受羈押之行為，係涉嫌實現犯罪構成要件（即構成要件不法內涵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或係妨礙、誤導偵查審判（例如逃亡、串供、湮滅證據或虛偽自白等），亦無論受害人致受羈押行為可歸責程度之輕重及其因羈押所受損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補償請求，並非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等情事所必要，不符冤獄賠償法對特定人民身體之自由，因實現刑罰權之公共利益受有干涉，構成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時，給予所規範之補償，以實現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平等權之立法意旨。

本解釋指示應由相關機關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衡酌受害人致受羈押行為之情狀、可歸責程度及所受損失等事由，就是否限制其補償請求權，予以限制時係全面排除或部分減少等，配合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通盤檢討，妥為規範，屆期未完成修法者，系爭規定失其效力。

表 2 解嚴後大法官解釋與政治刑事案件補（賠）償措施進程

解釋號	時間	解釋理由要旨	解釋（對象）法規	宣告效力	變遷意義
228	77.06.17.	司法「違法」行為之國家賠償要件限縮於「犯職務之罪」及「經確定判決有罪」之「司法違法（枉法裁判）行為」，以維護審判獨立，亦未抵觸憲法平等及比例原則	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	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司法不法行為國家賠償責任」合憲	未涉及刑事違法之權利回復或補（賠）償問題
477	88.02.12.	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適用對象除受無罪判決者外，擴張至「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仍受羈押或未依法釋放者。	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	解釋適用個案重新起算 2 年請求權時效	擴大回復條例適用對象範圍，將憲法平等原則帶入補償法規之違憲審查思維
487	88.07.09.	揭示「冤獄賠償為國家賠償之特別規定」定位，並宣告冤獄賠償法明訂「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應施以保安處分」之排除請求規定違憲	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2 款前段	宣告違憲，自解釋時起不予適用	將「請求權排除之比例原則概念」引進冤獄賠償立法
567	92.10.24.	由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引伸國家行為「拘束人身自由」定義與實質效果之明確化，並宣告「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規定違憲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宣告違憲，自解釋時起不予適用	人身自由權利「實質拘束」之受損效果明確化
624	96.06.06.	基於憲法平等原則，指明凡自 48 年 9 月 1 日冤獄賠償法施行後，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如合於冤獄賠償法第 1 條之規定者，均得依該法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冤獄賠償法第 1 條	解釋適用個案重新起算 2 年請求權時效	擴大冤獄賠償對象範圍，延續 477 號解釋所援引之憲法平等原則理念
670	99.01.30.	以「公益特別犧牲補償」之法理論述，指出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受羈押」之排除規定，並未斟酌受害人致受羈押之行為之原因動機，亦無論受害人致受羈押行為可歸責程度之輕重，及其因羈押所受損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補償請求，並非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等情事所必要，不符比例原則與特別犧牲補償之限縮範圍。	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	應由相關機關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2 年內，配合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通盤檢討，妥為規範，屆期未完成修法者，系爭規定失其效力	引進「公益特別犧牲補償」法理，另延續 487 號「比例原則」帶入冤獄賠償排除規定之違憲審查。

資料來源：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要旨、理由書。本文分析整理。

參、「克服過去」模式與補償正義於台灣之實踐

一、克服過去之正義觀與台灣經驗之轉型脈絡

戒嚴時期政治刑事審判案件，對於人民憲法基本權乃至於刑事權利之扼傷，衍生存在於立法、司法及行政之權力制衡疑慮，藉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部分條文，作為戒嚴法制運作的前導，並透過部門刑事法制，作為實質規範核心，最主要起源於民國 38 年 6 月 21 日公布施行之「懲治叛亂條例」及民國 39 年 6 月 13 日公布實施「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渠等高度政治性之立法思量，無論以「法規實證分析：從上而下」（Top-down）或「個案經驗分析：從下而上」（Bottom-up）的政治刑法研究途徑，均不難導出戒嚴時期政治刑法思考周密，網羅全面之特性（陳顯武，2007a：157），該等國家作為違反權力分立及基本權保留之指摘，且加深恣意行政行為對於正常化法制架構之危害，仍有論述可參（江如蓉，2004：122-128）。¹²

從戒嚴時期的「有疑必罰」，至解嚴迄今刑事法原則「無罪推定」，法規實證面粲然而備，舉凡「法治國原則（Rechtsstaatsprinzip）」之「基本權保留（Grundrechtsvorbehalt）」、「法律保留（Gesetzesvorbehalt）」

¹² 舉出恣意立法顯現在「死刑立法違反比例原則」、「死刑立法在法益審查及刑法謙抑原則」、「軍事審判透過特別法規定架空司法權，違反權力分立」、「戒嚴法制多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懲治叛亂條例第 5 條」；恣意行政則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行政作為」、「違反法律優位原則之授權立法」、「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判決核閱制度」等情形；最後，在恣意司法部分指出「司法不獨立」、「審判違法或不當：違背溯及既往原則、違反證據法則、量刑欠缺客觀化」等現象。

或「法定性原則」之「罪刑法定主義（*Nullum crime, nulla poena sine lege*）」等理念，至大法官會議第 556 號解釋，更向「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之法治國方向大步邁進，以人性尊嚴為依歸，避免「惡法亦法」所形塑之非常（轉型）時期人權侵害（陳顯武，2007a：161）。

戒嚴時期特定刑事判決以現今法治國刑法理念以觀，著實存有曠遠的落差，政治刑法之操作，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紀律之重大需求，尤其以戒嚴時期刑事判決過度偏重自白，並大量使用供述證據作為有罪判決唯一基礎，可徵諸前揭個案對於法定證據方法的取捨，多以單一證人供述，即對被告預作有罪認定，並反映於政治刑事判決個案中，此外，戒嚴法制亦採用相當嚴密之控制理念，例如檢肅匪諜條例賦予個人「檢舉叛徒」之義務，因此，形成言論箝制（寒蟬效應）與被懷疑者之社會網絡斷絕，亦足以體會渠等所受政治刑法施加予人權剝奪之深層痛苦（陳顯武，2007b：160）。

此種當今殊難想像而悖離嚴格證明及自白法則的實務現象，違背罪刑法定及罪責相當之統治規範，其所罔顧被告之對質詰問權，違背直接審理主義之要求，在戒嚴時期政治刑案裡隨處可見。然而，趨向於集體安全、穩定統治與捍衛意識型態的國家觀，使得該等刑法的政治決定，在當時已無法支撐判決個案之實質理性及程序正義，終究使該制度之存續，肇致原應受到嚴格檢驗的證據法則、認事用法及罪刑相當等審判實務問題，均無法逸脫於（政治）權力決定論的陰影之外。

然而，解嚴迄今 20 餘年，法制規範隨同國家正常化而迅速變遷，形塑我國轉型期法治的進步現況，環扣於刑事、歷史及補償正義的自由化民主轉型課題，藉由補償基金會及法院的行政、司法雙軌踐行補償正義，以期形成嶄新的認同啓程。至於對過往「真相的平反」，以期達成歷史正義與刑事正義的連結，反饋於「提供被害者補償」以促成和解契機，在我國是否得以再次邁進？而與刑事正義連結的轉型期

歷史，亦足以達到刑事懲罰的象徵性目的，乃至於妥協於「有限度個人責任之追究」（鄭純宜〔譯〕，2001：44-45），依然是欲語還歇之等待琢磨。是以，我國轉型期法治取決於特別刑事法之謙抑化需求、刑事訴訟新制體現被告憲法權利的進展，以及厚植刑事審判程序之憲法基礎，無一不在歷史辯證發展中，找尋著彼此共同克服過去的獨特脈絡時空。

然而，吾儕尚非得以預設採取所謂民主秩序自由化轉變的歷史責任論點（歷史正義論），亦非試圖提供轉型期「刑事正義」理論所提及對於先前統治者的審判與責任追究素材，至於國家政治變遷時，同時具有功能性與象徵性意義的「補償正義」理念，亦無法一蹴可幾「承認政治刑事判決侵權之個人權利（追訴體系不法中之侵權行為個人責任）」目標（鄭純宜〔譯〕，2001：118-119）。唯有慎重的試圖透過官方文獻、個案判決與斯時行政措施的重新覽讀，以呈現戒嚴時期政治刑事案件之原貌，尋其規範運作基礎，同時透過制度運作的影響分析，揣摩統治者處理政治刑事案件時之價值思維，縱然採取調合介於「超個人主義／共同體優先」，與「自由主義／人權至上」之價值相對觀點，終究期待以轉型期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為論述宗旨之辯證發展，運用法律之政治分析途徑，藉由戒嚴時期刑事案件的價值相對主義思索，作為勾勒一個經由辯證與進步而來之反省出發點（陳顯武、葛祥林，2003：20）。

需知共同體雖可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以政治刑法來對異議份子逾越民主決議之尺度加以限制，但個人人權也非完全可以由國家任意予以處分（unverfügbar）（陳顯武、葛祥林，2003：20）。若國家恣意透過立法制定對人權核心過度侵害之政治刑法，則此種政治刑法，失其正當性，形成惡法。當然在政權輪替後政治轉型，會留下需面對自己過去體系轉換間遺留下的包袱，此乃是一個國家所必須「克服體系不法的過去」及避免未來重蹈覆轍之課題，此也是當今「轉型正義」核

心概念所在（陳顯武，2007 b：168-169）。

晚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甚至在其判決中明白表述人性尊嚴是有其根本性，無須國家承認；人性尊嚴是其他基本權之權源，高於其他基本權，非但為普世價值，且具有與其他基本權利之比較，具有優先性。因此人性尊嚴，乃是當今及未來全球化之正義訴求及普遍一致之實踐判準，以臻「克服過去」及「轉型正義」的本土法學研究本旨（陳顯武，2007 a：219-242）。¹³

然臺灣特有之轉型脈絡，展現在補償基金會的主要工作裡，對於冤、錯、假案，予以行政補償，其所依憑者，原則上亦不外乎前揭政治刑事案件所留存之證據資料，透過向政府機關調閱卷證之途徑，取得包括判決在內之卷證資料，尤其是當事人之人身自由受拘束依憑之押票、釋票、羈押通知書及入出監獄（看守所）資料，甚或在非正當刑事程序限制其人身自由之案件，經由證據檢視，予以准駁或決定可補償範圍、日數及理由等，分析各類申請補償案型，藉由行政補償作為克服過去的起步。是以。民國 88 年 4 月 1 日開始正式運作迄民國 98 年 6 月 30 日為止，補償基金會受理 8,767 件申請案，准予補償者達 7,000 件之多，審查小組主要工作即在於「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最終做出賠償基數認定，即依申請人所提書面及檢具之資料，調查事實，用以認定是否為「受裁判者」，並按現行法律及證據法則審查（陳顯武，2007a：223），認定是否確實觸犯內亂與外患罪，及是否同一事實重複申領（補償條例第 8 條參照），參照條例規範意旨，大抵採彈性而有利於當事人解釋方向辦理，基金會亦考量到「資訊對稱」及「政府資訊閱覽」之現況與意旨，處理個案詳盡調閱案卷，作為事實不明個案之認定依憑。

在處理戒嚴時期政治刑事案件時，回歸第一手卷證、筆錄及相關

¹³ 此即為關於德國克服過去經驗之探討，運用在台灣本土法學之研究。

人證、物證，並以當前之法規範（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及憲法）作為審查基準。最常見之補償個案，即是前述以自白作為唯一證據之情形，以及戒嚴時期處罰「思想（閱讀）犯罪」之不可思議，均顯見過往「重視自白取證，卻忽略自白任意性與真實性之證據法自白問題，極易衍生『為求自白不擇手段』的不正方法取供，訴諸集體思想與國家安全作為前導，以「匪諜」、「叛亂」等價值非中立語句，誇飾「政治犯」之惡性，以致法院刑事判決，無論在法制層次或實務面向，均脫離正當法律程序與嚴格證據法則。對此，除了突顯時空落差問題，更是政治力介入法院判決所導致，尤其使人難以釋懷。該等「政治案件」，本質上即有濃厚的「法律性格」，若非以迭經變遷進步之刑事法治思維（當然包括國際刑法趨勢），作為當前憲法及刑法之原理原則，法律工作者對於「正義」之認知與追求，在補償基金會每週大約處理 60 餘件「政治刑事案件之行政補償」審查，堪認饒富臺灣經驗之克服過去實踐。

也唯有「昨是今非」或「昨非今是」之時空落差，體現出「克服過去」的必（重）要性，尤其在解除戒嚴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逐一誕生作為我國轉型正義之「補償正義核心規範」，其立法技術正足以左右著該等理念實踐之進展。

因此，該等「理論性語詞之中介語詞運用（例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所使用「受難者」及補償條例的「受裁判者」之用語等）」（陳顯武，2007a：223），有助於法律條文的簡化，亦使得立法密度適切，適用法律之推理將更為順利。進而，民國 84 至 87 年間，逐一建構我國刑事補償法規範基礎之後，又透過「法律修訂」及「司法（憲法）解釋」，將「受裁判者」擴展至「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等四類情

形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因而，由「受裁判者」延伸走向「限制（拘束）人身自由」，更可徵見該條例使用中度複雜的邏輯結構與技巧，正突顯出我國法規範層面，對於該等行政補償之法律保留，展現在立法決定下，對於克服過去所要面對的「政治（刑法）決定」，採取「廣義」、「立法用語彈性」之政策取向，以因應戒嚴時期刑事案件中複雜之事實，以及證據資料取捨及舉證強度因時間經過而衍生之侷限性，而給予「簡約」概念理解，反映在前揭大法官解釋的歷程，時至民國 99 年當前，甚已將該等刑事補償之法理基礎，導向「公益特別補償」，更引領規範蛻變之進一步契機。

解嚴迄今，刑事補償法制隨同國家政治民主化而獲珍視，型塑我國面對克服過去的積極進展，圍繞於刑事、歷史、行政、憲法及補償正義的多元化政策與措施，藉由基金會與司法機關共同踐行補償正義，在司法機關認定賠償基準相較為嚴格的同時，透過補償條例之立法修正，及基金會極具效率之行政補償流程，以民主人權的角度審查案件，對於戒嚴時期對人身自由造成侵害，公正地給予補償，以彰顯現階段國家發展力求法治國實踐，同時對統治體系所犯過往錯誤的轉型問題加以克服，經由此過程，凝聚國民對於正義及民主法治的認同（鄭純宜〔譯〕，2001：118-119），另此種二元機制，亦形成我國處理轉型正義之特色，亦即所謂饒富台灣經驗之轉型脈絡。

二、我國補（賠）償雙軌措施之實證分析與前瞻

任何時代的任何政權，行使其統治運作，均存在對於反對者，有循民主政治之政黨競爭者，亦有採取壓迫手段者，亦即針對任何政治體制或統治者，總會存在著反體制與反迫害的政治反對者，因此，每個時代的每個社會，尤其在民主開發中國家，無例外存在著政治犯罪（林山田，1990：1-17）。然而，政治犯罪概念的內涵，非普通刑法規範所能完全涵攝，有屬內亂、外患罪等明顯政治性格之罪名，亦有

一般刑罰條款，例如殺人、傷害、妨害公務、妨害秩序等罪名，並充斥著特別刑法規範，例如前揭戒嚴時期懲治叛亂、匪諜等規定，在政治事件之個案中，亦難以明確界定所有權利之受損類型，因此，凡出於政治動機而違犯之犯罪，悉可納入政治刑法指涉範疇，得以事件本身作為區別範圍，亦得以法益侵害觀點，作為補償範圍類型化之指稱。

從而，我國前述「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及「冤獄賠償法（國家賠償法）」等刑事補償規範，首先要處理者，即是各該「規範補償對象」及「國家不法行為類型」之界定問題。亦即，「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所稱「受難者」，係指「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此用語定義包含法益觀點，包含「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權」，而侵害行為主體則為具體之「公務員（行為人）」或「公權力（體系行為措施）」，所由生之事件則限縮於「因二二八事件」而生之權利侵害。賠償範圍則包括「死亡或失蹤、傷殘者、遭受羈押或徒刑之執行者、財務損失者、健康名譽受損」等。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所稱「應受權利回復」之「人民」，係屬「戒嚴時期」「犯內亂、外患、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之罪者，包括「治安機關逮捕，釋放前，人身自由受拘束」、「不起訴處分前受羈押，不起訴處分後未依法釋放」、「無罪判決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無罪判決後未釋放」、「有罪判決或感化教育、感訓處分，執行完畢，未依法釋放」等權利侵害類型，係由各級地方法院依冤獄賠償法規定審理。至「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所稱「受裁判者」，係指人民在「戒嚴解除前」，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付感化教育者。其有罪案件之刑罰類型，包括執行「死刑、徒刑、交付感化（訓）教育及財產被沒收」等，係由補償基金會為行政補償。

民國 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前「冤獄賠償法」所稱「受害人」，係指「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者」及「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修法後，則係指「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不受理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收容」、「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不受理或撤銷強制工作處分確定前，曾受羈押、收容、刑之執行或強制工作」、「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收容」、「依重新審理程序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前，曾受收容或感化教育之執行」、「不付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留置」及「依重新審理程序裁定不付感訓處分確定前，曾受留置或感訓處分之執行」等型態。

若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三者均包括於廣義之「刑事補償法制」內，三者間產生競合情形，是立法上則以「同一事件不得重複請求（一事不再理）」作為折衝，避免重複補償作為衡平規定。

惟「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所稱「因本事件所生」之時間界定（包括事件之後「綏靖清鄉」時期），而「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則明確界定於「戒嚴時期（即民國 38 年 5 月 20 日起，至民國 76 年 7 月 14 日止）」（第 2 條），未若「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適用時間界定之「戒嚴解除前」，實例即存在「1947 年（民國 36 年）：6 件、1948 年（民國 37 年）：1 件」准予補償案件，雖補償條例第 2 條明確定義戒嚴時期（期間同回復條例前述第 2 條），並未限縮於「38 年 5 月 30 日宣告戒嚴」之後。

再以補償措施以觀，「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採取「回復名譽、更正戶籍」（第 6 條）、「金錢賠償」（第 7 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則包含「公權資格回復」（第 3 條）、

「財產發還、金錢賠償」（第4條）、「國家（冤獄）賠償」（第6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則與回復條例同採「回復名譽、更正戶籍」（第4條）、「金錢補償」（第5條）。

表3 我國刑事補（賠）償法制規範競合現況

刑事補償法規	執行機關（構）	適用對象	補（賠）償範圍	補（賠）償措施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84.4.7公布）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受難者」：「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	適用於因二二八事件所生之損害賠償。賠償範圍則包括「死亡或失蹤、傷殘者、遭受羈押或徒刑之執行者、財務損失者、健康名譽受損」	「回復名譽、更正戶籍」、「金錢賠償」，無「同一事件不得重複請情（一事不再理）」之規定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84.1.28公布）	司法院所屬各級地方法院	「應受權利回復」之「人民」，係屬「戒嚴時期」「犯內亂、外患、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之罪者	戒嚴時期（即38年5月20日起，至76年7月14日止），包括「治安機關逮捕，釋放前，人身自由受拘束」、「不起訴處分前受羈押，不起訴處分後未依法釋放」、「無罪判決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無罪判決後未釋放」、「有罪判決或感化教育、感訓處分，執行完畢，未依法釋放」等。	「公權資格回復」、「財產發還、金錢賠償」、「國家（冤獄）賠償」，無「同一事件不得重複請情（一事不再理）」之規定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87.6.17公布）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受裁判者」，係指人民在「戒嚴解除前」，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付感化教育者。	76年7月14日解嚴之前，「有罪案件」之刑罰類型，包括執行「死刑、徒刑、交付感化（訓）教育及財產被沒收」	「回復名譽、更正戶籍」、「金錢補償」，有「同一事件不得重複請情（一事不再理）」之規定（第8條）「同一原因事實，已依法受領冤獄賠償或二二八事件補（賠）償」
冤獄賠償法48.6.11公布 96.7.11修正	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 地方（軍事）法院	「受害人」，係指「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不受理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收容」、「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不受理或撤銷強制工作處分確定前，曾受羈押、收容、刑之執行或強制工作」、「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		羈押、收容、留置及徒刑、拘役、感化教育、感訓處分或強制工作執行之賠償，依其羈押、收容、留置

刑事補償法 規	執行機關 (構)	適 用 對 象	補(賠)償範圍	補(賠)償措施
		之裁定確定前，曾受收容」、「依重新審理程序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前，曾受收容或感化教育之執行」、「不付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前，曾受留置」及「依重新審理程序裁定不付感訓處分確定前，曾受留置或感訓處分之執行」等國家處遇對象。		或執行之日數，以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折算一日支付之。其餘類型，亦以金錢賠償為之。
國家賠償法 69.7.2 公布	地方法院 (民事庭)	請求權人(適用民法規定)	「公務員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金錢賠償，回復原狀(第7條)
刑事補償法 (100.6.1 公布)	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 地方(軍事)法院	實質限制人身自由認定種類之擴張：新法增訂鑑定留置及強制工作以外之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例如：刑法規定的監護、禁戒、強制治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處分。 國家補償處遇類型之擴張：新法增加檢察官撤回起訴、法院裁定駁回起訴、法院判決免訴、撤銷保安處分或駁回保安處分聲請、拘束人身自由的期間超過有罪判決所定的刑或保安處分期間，及同一案件經重複判決的情形。		依死刑、拘束人身自由性質的刑罰、保安處分及強制處分、財產刑的執行，所致被害人權利受侵害程度輕重，而異其補償金額的決定標準。另配合刑法第41條、第42條之1修正，增訂易服社會勞動之補償標準，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之補償，依其執行折算的日數，以新臺幣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折算一日支付之。死刑執行的補償，除其羈押依規定補償外，並應接受刑人執行死刑當年度國人平均餘命計算受刑人餘命，以新臺幣5000元折算一日支付撫慰金。但其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1000萬元。

資料來源：補償、回復條例及冤獄賠償法等條文及司法院 100.6.13 新聞稿¹⁴。本文分析整理。

¹⁴ 司法院新聞稿摘錄如次：根據國際人權公約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70號解釋意旨，司法院通盤檢討冤獄賠償法制，擬具「刑事補償法修正草案」，共41條，函請行政院會銜後，送立法院完成三讀，自100年9月1日施行。綜觀刑事補

肆、國際刑法理念對克服過去之實踐契機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之寬廣概念，指涉「朝向自由化的方向改變」，由較不民主轉型為較民主的政體（鄭純宜〔譯〕，2001：118-119），多數面對政府體系不法的過往，亦同時克服著轉型期之課題，從壓迫體制轉型至自由民主秩序之存續體制國家，新舊體制間的「連結」與「切割」，難免觸及「刑事審判」與「非刑事制裁」之兩難。

內國法庭或將依國際法原則，基於新法令，將舊政府之鎮壓抗暴運動的行為，視為「戰爭罪」或「殘害人類罪」，因而，法治必需有「連續性」，此種連續性，被認為「存在於國際法的標準中」，其標準「高於國內法」，在違反國際人權的罪行，將法律時效性的延長視為有效，或甚無時效消滅問題。

在國內法領域，採取國際法優越的「一元觀點」，植基於自然法

償法，有下列特色：一、將「冤獄賠償法」名稱改為「刑事補償法」。二、擴大得請求補償之處遇種類及事由：（一）擴大人民可以請求補償的「種類」、（二）擴大請求補償的「程序事由範圍」：（三）減縮不得請求補償之事由：落實大法官釋字第 670 號解釋，刪除「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理由」而駁回冤賠的請求，將來法院再也不可以用請求人的行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駁回請求。三、建立公平的補償法制：（一）基於補償正義及合理補償原則、（二）重構「得不為補償之情形」、（三）調整補償金額之決定標準。四、補償程序保障程序利益：舊法時冤賠事件，大多不開庭，新法為保障補償請求人的程序利益，初審決定機關，應該傳喚補償請求人、代理人並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五、增訂補償後對公務員求償規定。六、釐清補償與國家賠償之關係：受害人依刑事補償法所得的補償外，假如請求人還有其他損害，在符合國家賠償法規定的情形下，請求人還可以依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七、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被駁回請求者之救濟，刑事補償法增訂「回溯五年條款」，讓過去五年的冤賠請求，被法院以請求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駁回請求的，可以在 100 年 9 月 1 日起兩年內，以原確定決定所適用的法律抵觸憲法為理由，聲請重審。

（陳顯武、連雋偉，2008：37），¹⁵ 認為國際條約與習慣法之法源，應溯源於具有普遍性之「一般法律原則」，因此，對於「大規模侵害人權犯罪行為之遏止」、「對過往體系不法之責任追究及法益侵害之補償」，「修訂內國法律以符合普世人權價值」等作為，當各國向內建立轉型期之法秩序而制（修）訂法律時，所普遍採用之「基礎規範」，並為各國間共同遵守與實踐時，基於「承諾，即應遵守」等一般法律原則之共通性，國際法與國內法實應置於同一法規範體系下加以理解。

因此，國際法約束力並非僅止於「各國國內法的延伸」，亦非僅視為各國間所形成的共同意思合致，而應溯源於存在國際法之外，透過多數國內法「共同實踐與法律確信」而匯集而成的「基礎規範（自然法）」或「形成規定」，並體現在多數的國際法規範內，條約如是，習慣法亦然，皆宜將國際與國內法定性為完整單一的法秩序體系（黃異，2006：3-6）。¹⁶

國際刑法（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係國際條約、習慣法和一般法律原則中各種刑法規範之總稱，明文規定何種行為類型構成「國際犯罪」，且對於該犯罪應如何「制裁、防止、懲治（科處刑罰）」之國際法規範，旨在制裁國際犯罪，避免其對於人類和平與安全、基本人權、國際秩序與國際社會利益之侵害（Werle, G, 2005: 25-28），並因國際社會係由各主權國家或國際組織所構成，如何建構具有實際執行效力的組織架構與程序規定，以及國際司法互助的配套融合，更

¹⁵ 指出歐盟權利憲章之前言，即可窺見自然法思想端倪，擺脫傳統立法絕對主義與法律實證主義的束縛，強調人類不可侵犯與剝奪的權利。

¹⁶ 指出：從法位階角度觀察，所有的實證規定，均溯源於一個基本規範，該基本規範並非實證法，而係自然法，基本規範之內容即為：「凡合意，應予遵循」，依據基本規範，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皆得創設規定，規制其間之關係，或創設一些「形成規定」（包括條約及習慣法）。

為國際刑法體系發展的關鍵，亦為轉型時期如何克服「體系不法」之過去所匯集而成的國際共識展現（鄭文中〔譯〕，2007：4、22）。

國際刑法的內延定義，一般認為包括國際公約中各種懲罰與制裁國際犯罪之實體規範，同時指涉國際刑事合作之程序機制。「狹義的國際刑法」僅將國際刑法視為「具有涉外因素(International Element: the Offence Containing External Factors)的國內刑法」，或將「跨國犯罪」與「國內刑法的域外適用」齊視為國際刑法之範疇（Werle. G, 2005: 29），而採用國際法廣義觀點的國際刑法論者，則係立足於國際犯罪之防制觀點，強調國際刑法具有下列特徵：(1)國際刑法是國際社會「以國際公約方式」共同制定的刑事法規範；(2)國際刑法是以「國際犯罪」為制裁對象的法律規範；(3)國際刑法是以國際合作為基礎的實體、程序與組織法律規範。

至此，國際刑法對於轉型正義之實質意義，皆可回歸國際法國內法化之基本理論以觀，「國際法優位的（絕對）一元論」主張國際法具有適用及解釋上的優先性，既以同一法秩序認知國際法與國內法間競合時之決定基準，從而，當兩者發生差異時，最終仍應以國際法所作為國內法配合修正之基本框架，因此，體現於國際刑法中之普遍刑事理念，作為各遭遇轉型正義問題之內國而言，即是克服過去得以引藉之原理原則。

為緩和絕對一元觀點落實於國內法規範時之窒礙，相對一元論雖仍採取「解釋上的一元觀點」，但在適用與調合國際與國內法差異時，則採取「特別引入（Specific Adoption）說」，取代二元論之「變質（形）理論（Transformation Theory）」與絕對一元論的「直接適用（Direct Adoption）說」或「概括引入說」。將國際法引入國內法規範時，係由國內法決定引入之程序，至於國際法引入後，其在國內法架構內位階，亦委由國內法訂定。

因此，基於國際法優於國內法之觀念，無論在國際法或國內法優

位之一元論觀點，內國法庭將依循國際法的標準來解釋憲法，並認定「一般認可國際法原則具有優先地位」。此外，仍有部份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國際法的優先地位，使得在整個區域中，國際法成為詮釋處罰政策的司法基礎，因為「這些規範被認為超越舊政權的『政治化法律』」，得以妥適處理「政治刑事案件之問題」。國際法不但保存一般對法治為既定法的認知，並賦予轉換能力，調解了轉型的國際法原則，可在政權轉型時期調解法律上的困境，得以適切處理克服過去的議題。國際刑事法或許提供了可理解的方式，將藉由法律來規範先行政權的責任加以概念化，國際法提供法律上的延續性（Werle. G, 2005: 25-28）（Werle. G, 2003: 81-89），特別是在「責任」認定的標準，並提供了「管轄權」的基礎，並超越國內刑法的限制（鄭文中〔譯〕，2007：15、13）。¹⁷

1993 及 1994 年設立之前南斯拉夫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即是聯合國安理會對國際犯罪實踐「國際追訴模式」的理念作為（陳顯武、蔡浩志，2009：51-80）。至於國際刑事法院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ICC Statute）（以下稱規約）則是在對於實體罪名之普遍、固有及強制管轄權外，再明文揭示「補充管轄原則」（Werle. G, 2005: 81-89），¹⁸ 仍賦予各締約國國內法院優先管

¹⁷ 引述（Gustav Radbruch）（賴特布魯）為世所孚望的自然法論證：「一個在行為當時被接受的正當或合法性理由，將因違反更高位階的法規範而遭到否認，尤其否認之理由係因該行為嚴重抵觸正義與人性尊嚴」；「與正義嚴重抵觸，必須重大侵害國際社會對於人類價值及人性尊嚴有關之法律確信，而與該等價值或確信相衝突的實證法律，該衝突必需是無法為人類良知所忍受，以致於作為『不正之法』的實證法律，偏離了正義」。

¹⁸ 說明該法典將國際刑法國內法化係以規約為貫徹對象，必然適度的修改調整規約內容，以適應國內法律體系的要求和標準，亦代表當各國間一方面普遍接受規約所匯集的國際刑事司法原則，同時亦必須面對難題於「如何折衷於國際法的實質規範和國內法的原則要求」。從而，德國立法者認為，在通常情況下，

轄權，試圖將國內及國際訴追之途徑加以結合。

實當 ICC 和國內法院對個案均有管轄權時，應當先由國內法院審理，因此，國際刑事司法框架若以規約為主導，「國際犯罪之國內追訴具體實踐」，仍將是國際刑事司法體制的重要框架。德國即在落實「規約」之背景契機下，透過國內立法頒佈「德國國際刑法典」（簡稱法典）相關立法，開啓對國際犯罪實施國內追訴嶄新進程。

表 4 國際刑法理念對克服過去法制變遷之影響

國際刑法理念	對於克服過去之意義	國內法化途徑	與轉型正義之連結
普遍（補充）管轄權	大規模侵害人權犯罪行為之遏追訴有效性	國內法優先之一元論	確保法治連續性，折衷人權與主權之間，強調追訴之有效性
國際犯罪實體罪名	修訂內國法律以符合普世人權價值	國際法優先之一元論（國際犯罪之罪刑法定主義）	實踐刑事正義，建構普世人權價值，並定義大規模侵犯人權之國際犯罪實體罪名
無時效制度	對過往體系不法之責任追究	國內法優位之一元論（國際實踐所肯認，但多有緩衝，例如赦免、減刑或緩刑等刑事處遇）	歷史正義、刑事正義之綜合思量，以懲治元兇，發現真相，作為保留追求歷史正義之途徑
體系不法與個人國際法責任	對過往體系不法之責任追究	國際法優位之一元論（國際實踐中，對於體系責任由個人承擔之分野，仍存有爭議）	體系不法之國家責任實踐，仍存有個人國際責任未定之空間，亦得以補償方式（補償正義、行政正義）作為體系責任之承擔。
國際刑法之國內法化	對未來及過往侵害人權事件刑事歸責	一元論與二元論觀點皆備	建構國際刑法之普世人權基準

資料來源：國際刑法國內法化之規範取向分析乙文。本文分析整理。

適用一般刑法懲罰國際犯罪，能產生與適用規約相一致的結果，本文引申以為，德國在國際刑法典的國內立法上，仍透過立法程序，且將國際刑法架構於國內普通刑法基礎上，宜以「國內法優位之一元論」觀點視之，而採用「特別引（併）入」之國內法途徑。

伍、結語－我國刑事補償與克服過去之延伸與展望

英美所稱轉型正義，即德國所稱克服過去，在台灣實踐經驗裡，自前揭「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肇始，延續著「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及「冤獄賠償法 96 年修正」、「民國 100 年刑事補償法修正案」，架構出法規範基礎之延續性連結。藉由補償基金會成立十餘年來，處理受裁判者補償金之申請與核發作為第一要務，即使已受理 8,000 件以上之申請案，准予補償者亦超過 7,000 件之多，據基金會統計追查，仍有 4,000 餘件尚未提出聲請，因此，補償正義之實踐，核發補償金額超過新臺幣 180 億，另外再加上二二八事件之補（賠）償、依回復條例適用冤獄賠償法向地方法院請求，及按照冤獄賠償法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等管道，均顯示補償正義在臺灣實踐所累積的成果，該等數據背後代表的反省、和解、秩序與正義，將在臺灣歷史中，劃下不可磨滅的記印。

按照補償條例第 2 條及組織章程第 16 條規定，申請補償期限已在民國 99 年 12 月截止，此繫於法安定性、秩序穩定及請求權時效規範所為之法制設計，將帶給補償基金會另一度轉型深化的契機。亦即，補償金的發放，只是補償作業的一部份，亦即第一個十年裡最重要的初步任務，再來的轉型，朝向公益、教育、展覽及研究面向，尤其是資料的蒐集與建立，並因應國際化進程，加深與國際間之交流，並應結合政治、法律、心理、歷史與社會科學專業，進行跨領域的研究，朝向我國「克服過去（轉型正義）研究核心」之目標前行，亦即轉型為「常設性之紀念基金會」，進行人權教育及研究（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9：92）。

然而，在補償正義擔當了克服過去任務的大部分責任的 10 年間，輿論間對於「追求真相」及「懲治元兇」之呼聲仍絡繹未減，雖然在台灣的特殊政治自由化環境裡，同步於選舉語言、競選策略等失焦之可能性極高，亦表徵著克服過去議題，在台灣更隨同著政治民主化的腳步，亦有著極其特殊的情境，亦是主政及倡議之各方，對於補償正義、歷史正義，乃至於刑事正義問題處理時更應謹慎細膩之處。

進而，若能將克服過去此一「政治性格」濃厚之工程，賦予法律規範之外觀，尤其在民國 99 年 4 月 22 日公布施行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明訂「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 2 條）、「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兩公約規定事項；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第 5 條）」，及「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第 8 條）」等規定，進而檢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 條「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及第 15 條「任何人之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構成犯罪」之規定，前者，可謂刑事補償法制之國際法源，後者，則為國際犯罪法定主義結合無罪推定原則之展現，均得用以作為臺灣克服過去與國際接軌之概念理解之一。

臺灣特殊歷史經驗的脈絡裡，正義沒有轉變，轉變的是統治者對於正義概念的濫用，所以國際刑法的興起作為普世價值的實踐，可能因永恆不變的正義在 20 世紀末及 21 世紀初的落實，而在內國法與國際法間咸具共識（鄭文中〔譯〕，2007：15-16、27-28），基於國家安全、穩定統治之民族整體概念，相對於民主秩序基本價值與人權維

護之間，審視政治系統與法律系統各有其功能與符碼的平行關係裡，系統之間如何經由「法與不法」、「有權力及無權力」的操作，並以法律之政治分析途徑，透過法治國進步發展的脈絡，引導出終止戒嚴後法治轉型之時代意義，並反思動員戡亂之戒嚴時期，充斥價值相對主義之緊張關係裡，統治者採取如何調合介於「超個人主義／共同體優先」，與「自由主義／人權至上」之國家觀點（Radbruch. G, 1990: S146f.），不管是「克服過去」也好，「轉型正義」也好，都是正義理念的訴求與實踐。

「一有懷疑，人權優先（*in dubio pro iuribus hominis*）」，是以，未來，不應再讓政治刑法作為統治工具，因而國際刑法的發展，極富預防性理念，而揚棄過往的包袱，歷史辯證的發展才能使臺灣民主法治的腳步無盡的褪變與新生。深化補償正義，並透過法規面的建構，實踐刑事正義，並在追究元兇的部分，融入國際實踐的適當援引，皆得為吾儕用以堅持民主憲政及法治國理念的正義期盼。

附錄 我國刑事權利補償法制重要規範沿革一覽表

時期	特徵	時間起迄	重要刑事法及補償規範變遷
一	解嚴終戡過渡期	76.7.15 前後至 84.1.28	74.7.19 公布「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 76.7.1 公布「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76.7.3 公布「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 76.7.9 公布「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及其施行細則施行後辦理刑事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76.7.15 廢止「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 76.7.15 廢止「戒嚴期間臺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 76.7.1 公布「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76.8.3 廢止「臺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 77.6.17 大法官會議第 228 號解釋 78.1.27 修訂「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80.4.30 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 81.7.29 修訂「檢肅流氓條例」（原「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 81.7.29 修訂公布「國家安全法」（原名稱：「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二	權利回復創始期	84.1.28 至 87.6.17	84.1.28 公布「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 84.4.7 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85.2.14 公布「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施行細則」 85.2.5 修訂「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 86.2.25 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 4 條 86.9.25 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 2 條 87.5.28 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 3、8、16 條
三	行政補償轉型期	87.6.17 至 96.7.11	87.6.17 公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87.12.17 正式施行） 87.9.5 行政院核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 88.2.12 大法官會議第 477 號解釋 88.7.9 大法官會議第 487 號解釋 88.11.26 國防部核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 89.1.15 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 2 條 89.2.2 修訂「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增訂第 6-1 條 89.11.17 國防部核定修正「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第 3、

時期	特徵	時間起迄	重要刑事法及補償規範變遷
			6~10 條，增訂 4-1、8 條 89.12.15 修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 2、5、8、14、16 條 90.6.6 「補償基金會」公告修正「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全文 90.9.28 公布「國家安全法第八條第二項停止適用後法院與軍法機關移審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90.10.4 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 2、3 條 90.10.8 行政院核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辦法」 90.12.19 「補償基金會」公告修正「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第 3、10 條 91.12.13 修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 2、9、11 條，增訂第 15-2 條 92.1.13 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 2 條 92.8.7 行政院核定修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辦法」第 9 條 92.10.24 大法官會議第 567 號解釋 94.3.31 「補償基金會」公告修正「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第 11-1 條 95.2.21 「補償基金會」公告修正「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第 8 條 95.12.18 修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 2 條 96.3.8 修訂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原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四	國家責任確認期	96.7.11 至 100.9.1	96.7.11 修訂「冤獄賠償法」 96.6.6 大法官會議第 624 號解釋 98.6.5 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3、8 條，增訂第 3-1、3-2 條 99.1.30 大法官會議第 670 號解釋
五	刑事補償再造期	100.9.1 迄今	100.6.13 修訂公布「刑事補償法」，並於 100.9.1 正式施行

資料來源：補償、回復條例、冤獄賠償法及刑事補償法等法規條文。本文分析整理。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 江如蓉（2004）。〈戒嚴時期違反法治國原則之國家行為—以叛亂犯之死亡案件為例〉，《國家發展研究》5(1): 112-128。
- 林山田（1990）。〈論政治犯罪〉，《刑事法雜誌》，34(3): 1-17。
-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9）。《走過十年，迎向未來，十週年紀念專書》，頁 92。
- 陳志龍（2001）。〈白色恐怖補償修法方向——就二〇〇〇年補償條例增修條文之評析〉，《法學叢刊》46(4): 37-63。
- 陳顯武（2000）。〈補償條例之法條邏輯結構分析〉，「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12月8日。
- 陳顯武（2007a）。〈戒嚴時期的政治刑法〉，《國家發展研究》，6(2): 165。
- 陳顯武（2007b）。〈東德柏林圍牆士兵射殺事件之處理與借鏡〉，「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月26。
- 陳顯武、葛祥林（2003）。〈法價值論中之超人格主義〉，《臺灣大學法學論叢》32(2): 20。
- 陳顯武、連雋偉（2008）。〈從「歐盟憲法」至「里斯本條約」的歐盟人權保障初探〉，《台灣國際研究季刊》4(1): 37。
- 陳顯武、蔡浩志（2009）。〈國際刑法國內法化之規範取向分析—以德國模式為借鏡〉，《軍法專刊》55(2): 51-80。
- 黃 異（2006）。《國際法在國內法領域中的效力》。臺北：元照出版。

鄭文中（譯），Haffke, B（原著）（2007）。〈人權觀點下之刑法暴力與國家承續－聯邦德國的法律實務與法學理論〉，「臺灣解嚴 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政治事件探討」論文。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11 月 24-25 日。

鄭文中（譯），Hassemer, W（原著）（2007）。〈政治體系更替後的刑法－以聯邦德國為例〉，「臺灣解嚴 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政治事件探討」論文。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11 月 24-25 日。

鄭純宜（譯），Ruti G. Teitel（原著）（2001）。《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變遷中的正義》。臺北：商周出版社。

二、外文文獻

Luhmann, N. (1995).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Werle, G. (2005).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M.C. ASSER PRESS.

Werle, G. (2003). *Völkerstraf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S.1ff.

Leg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Criminal Compensation Norms in Post- Martial Law Taiwan

Chen Sian-Wu^{*} & *Tsai Hao-Chih*^{**}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hanges in Taiwan's criminal law system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and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untry's criminal compensation law. Judgements by Taiwan's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are examined to analyze the process by which norms of criminal compensation law were revised.. By focusing on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Compensation Act for Wrongful Trials on Charges of Sedition and Espionage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and the Law of Compensation for Wrongful Detentions and Executions, the article brings to light Taiwan's experience with the practic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laborates on idea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for dealing with wrongful acts perpetrated by state systems.

Keywords: transitional justice, criminal compensation norm, legal transition, lifting of martial law, leg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ilitary Prosecutor, Prosecution Bureau in Higher-grade Military Court, MND.

